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第 四 次全体会议

199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举行
纽 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5(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54/333/Add.2)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文件 A/54/333/Add.2 所载一封信中,秘书长通知我,自文件 A/54/333 和增编 1 所载其来函发表以来,塞拉利昂已经交付必要的款项,将其欠款减至低于《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数额。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种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0

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A/54/1)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根据其 1999 年 9 月 17 日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定现在审议议程项目 10,题为“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听取秘书长提出年度报告。

我请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十分荣幸地在二十世纪大会最后一届会议上发言,提出我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大会面前有该报告案文。

在这个场合上,我谨谈谈下个世纪人类安全和干预的前景。过去一年中的剧烈事件,我相信大会将理解这一决定。

作为秘书长,我的最高义务是恢复联合国在谋求和

平与安全中的适当作用,并使它更接近其服务的各国人民。在我们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这项任务继续存在。但这项任务在我们仍未理解其持久意义的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环境变化改变的世界中继续存在。在我们谋求与象战争和贫穷这样的宿敌进行斗争的新方式时,只有在我们大家使本组织适应具有促进和平与进步的新角色、新责任和新可能性的世界,我们才能获得成功。

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正在重新界定最基本含义的主权国家。现在人们广泛理解国家是其人民的服务者,而非相反。同时,个人主权——我指的是我们的《宪章》所载所有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因重新意识每个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得到加强。

难以为这些平行发展——令人注目而且在许多方面令人可喜——作出容易的解释或简单的结论。然而,它们的确要求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联合国如何回应影响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在需要时使用的手段;以及我们愿意在某些冲突地区采取行动,而在其许多其它危机中限于减缓人类痛苦,这些冲突中每天的死亡和痛苦使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应为此而采取行动。

我们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反省不仅产生于去年的事件,而产生于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最紧迫的是东帝汶的挑战。从塞拉利昂到苏丹到安哥拉到巴尔干半岛以及到柬埔寨,然后到阿富汗,许多国家人民不止需要国际社会的同情。他们需要帮助结束其暴力循环并使其走上繁荣的安全道路的真正和持续承诺。

一方面卢旺达境内种族灭绝将为我们这代人界定面对大规模屠杀不采取行动的后果,另一方面,科索沃最近的冲突提出了有关国际社会在不十分团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后果的重要问题。这突显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困境:一方面,一个区域组织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有效制止严重和有系统地违反人权而产生重大人道主义后果的公认重要事项。

国际社会在科索沃情况中未能协调这两种同样重要的利益——捍卫人权的普遍合法性和效力——只能被视为悲剧。这揭示了下个世纪对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主要挑战:团结在一个原则下,即不允许大规模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无论在那里发生。

科索沃冲突及其后果引发了对于解决冲突,从巴尔干半岛到中部非洲到东亚的冲突十分重要的广泛辩论。可以向这场重要辩论各方提出困难问题。

对认为今后国际秩序最大威胁是在没有安理会授权情况下使用武力的人,人们可以问,不是在科索沃而是在卢旺达情况中,如果在那些导致种族灭绝的黑暗日子和时刻,一个国家联盟准备采取行动来保卫图西人,但未得到安理会及时授权,这个联盟是否应站在一旁而允许可怕情况发展?

对认为科索沃行动预示一个新时代到来,在这一时代里各国和国家集团可在已确立的执行国际法机制之外采取军事行动的人,人们可以问:难道这种干预没有危险吗?它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不完美但有弹性的安全体系;而且它为今后干预创造危险的先例却没有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谁可援引这种先例明确标准。

针对这种动荡的危机和干预时代,有人提出,《宪章》本身——它源于全球国家间战争之后——不适应在种族战争和国内暴力世界中指导我们。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

《宪章》是一份富有生命力的文件,其崇高的原则仍表明世界各国人民在和平、尊严与发展中生活的愿望。《宪章》中并没有条款规定不得承认超越国界的权利。的确,其文字和精神本身就确认了这些基本的人权。总之,使我们处于目前这一局面的并不是《宪章》的不足之处,而是我们将其原则运用于新时代中所遇到的困难,在这一新时代里,关于主权的严格传统概念已不再能够充分表达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其基本自由的愿望。

半个多世纪以前,起草《宪章》的各主权国家致力于和平,但更经历了战争。它们知道冲突的恐怖,但也同样知道,有时候为追求和平,使用武力可能是正当的。因此,《宪章》自己的文字就宣布:“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但什么是公共利益?谁来确定公共利益?谁来维护公共利益——根据谁的权威,以什么干预手段?这些是我们在进入新世纪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尽管我不会提出具体的答案或标准,但我要指出我认为对解决今后冲突具有重要教训意义的干预行动的四个方面。

首先,将干预的定义定得尽可能广泛是很重要的,以包括最温和的到最具强制性的整整一系列广泛的行动。今天,仍然无人注意和质疑的许多危机的可悲讽刺是,它们原本可以用远远不象我们最近在南斯拉夫目睹的干预行动那样充满危险的行动来处理。但是,国际社会对维持和平,人道主义援助和对恢复与重新建设的承诺因各地区和各危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面对极大痛苦作出新的承诺进行干预是为了维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那么作出这种承诺的方式必须是,也必须被认为是公正和一贯的,无论是哪个地区或国家。归根结底,人类是不可侵害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任何武装干预本身就是由于干预失败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在考虑未来干预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加强我们的预防能力,其中包括早期预警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以及预防性解除武装。

最近一个强大的威慑工具就是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法庭的行动。制止危害人类罪行的关键在于法庭反对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考虑到这些关切问题,我年度报告的序言部分将专门探讨从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的各种方法。最昂贵的预防政策在人命和资源方面比最不昂贵的武力要便宜得多。

第二,显然,仅主权并不是在人权或人道主义危机中采取有效行动的唯一障碍。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在任何特定危机中确定其本国利益的方式。当然,以传统的方式维护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以及安全理事会生活与工作的永久性特点。但是,我认为,由于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没有跟着改变。

我深信,在新世纪里对国家利益的新的、更广义的、更广泛地构想出的定义将会引导各国在追求诸如民主、多元化、人权及法治等基本的《宪章》价值观念中找到更大的一致性。全球性时代需要有全球性接

触。的确,在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中,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第三,在强制性干预成为必不可少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证,安全理事会这一负责按国际法授权采用武力的机构能够战胜这一挑战。正如我在科索沃冲突中所说的那样,绝对不是在一方面安理会团结及面对种族灭绝无行动(例如在卢旺达问题上)和另一方面安理会分裂及区域性行动,(例如在科索沃问题上)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两个问题上,联合国会员国本应该能够在维持《宪章》的原则中,并在捍卫我们共同人类的行动中找到共同点。

与安理会的执行权力同样重要的是其威慑权力。除非在事业正义和各种手段也齐全时安理会能够集体地显示自己的权威,否则其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如果一心想胡作非为的国家知道其边境并不是绝对的防御,如果它们知道安理会会采取行动制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它们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而指望主权豁免。

《宪章》要求安理会成为共同利益的维护者,除非在人权、相互依赖和全球领域它被视为维护者,就有其他组织可能企图取代安理会的危险。我谨指出,安理会果断而有效地采取行动,授权多国部队前往东帝汶正反映了我今天所要求的那种目标的一致性。但是,太多生命已经丧失,造成的破坏已经太严重,我们不能满足于既得荣誉。为东帝汶带来和平与稳定的艰巨工作仍等待着着我们。

最后,无论是东帝汶还是任何其他地方,在冲突结束之后,对和平的承诺必须和对战争的承诺同样坚定,这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一情况下,前后一致性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对人道主义行动所作的承诺如果要有合法性就必须具有普遍性一样,我们对和平的承诺也不能应敌对行动结束而终止。战争的善后工作需要同样多的技巧、同样大的牺牲以及同样多的资源,以便缔造持久的和平,避免暴力卷土重来。目前部署或即将部署的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其他特派团给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挑战。

除非联合国得到取得成功的手段和支持,不仅和平、而且战争化也会丧失。从行政管理和执法到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宽容的、多元化的、繁荣的社会的民间社会,我们的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与建设和平特派团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科索沃、在塞拉利昂、在东帝汶有必要的手段,我们就有真正机会一劳永逸地打破暴力循环。

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是一个空前苦难和暴力的世纪。对我们的最大和最持久的考验仍然是看我们是否有能力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人类的集体良知对残忍深恶痛绝,反对非正义和为所有国家人民寻求和平。如果这个良知不能在联合国找到它的最大讲坛,那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严重的危险:它将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和平与正义。如果它在我们的声音中听不到,并在我们的行动中看不到自己的愿望、需要和恐惧的反映,它可能很快对我们起作用的能力失去信心。

正如我们学到的那样,在发生严重和有系统地违反人权行为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也同样学到,干预必须以合法和普遍原则为基础,如果它要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持续支持的话。

这项正在发展的赞成干预以保护平民免遭大规模屠杀的国际准则无疑将继续对国际社会提出深刻的挑战。我们对国家主权和个人主权的理解所发生的任何此类演变将会引起某些人的不信任、怀疑、甚至敌意。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欢迎的演变。

为什么?因为尽管它存在着局限和不完善之处,但它表明人类对自己的同类中发生的苦难更加关心;并表明人类将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结束这种现象。这是二十世纪末的一个令人产生希望的迹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们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 10 的审议。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

在请一般性辩论中的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提醒成员大会在 9 月 17 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不得于发言结束后在大会堂内表示祝贺。

在这方面,我想提醒成员大会在同次会议上作出的另一项决定:一般辩论中的发言者在发言结束后应从讲台后面的 GA-200 号室离开大会堂,仍然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还想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发言者名单将在 1999 年 9 月 22 日星

期三下午 6 时结束登记。我请各国代表团提供尽可能精确的估计发言时间。这将便利大会的工作。

我现在想提请会员国注意第 51/241 号决议附件第 21 段,大会在其中提出自愿遵守一般性辩论中每次发言不超过 20 分钟的准则。在这个时限内,我吁请发言者以正常速度发言,以便能够适当地提供口译。

一般性辩论中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巴西外交部长路易斯·菲利普·兰普雷阿阁下。我请他发言。

兰普雷阿先生(巴西)(以葡萄牙语发言;代表团提供了英文本):主席先生,巴西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你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斗争中创造的维护民主和人权的个人纪录是激励我们工作的榜样。

作为乌拉圭的一个姐妹国,我们对你的前任,我的朋友迪埃·奥佩蒂部长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我要对他在主持第五十三届会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向巴西政府表示赞赏和感谢。

秘书长科菲·安南同样应该得到特别的赞赏。在这个国际社会面临影响深远和没有先例的挑战的时代,他的分寸感和他的镇定自若的领导所具有的力量在寻求现实和创新的解决方法中起了宝贵的作用。我们感谢和支持他在和平、发展与正义事业中作出的努力。

巴西政府热烈欢迎刚刚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被接纳为会员国。

在 50 多年中,我们年复一年地在这里聚会以讨论和辩论我们时代的各种问题。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年复一年地走上这个讲台以表达他们对全球事务的看法并提出分析和解决办法。

随着我们各国社会的要求越来越大,人们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距离只会滋长一些人的怀疑主义和另一些人的悲观主义。

无论何时一场正在发生的危机及其人的悲剧突破国际上的漠不关心,而变得有新闻价值,我们各国的公众舆论总是期待着从联合国得到有意义的回答。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只是在长期滋长的问题有可能失去控制时才感到不得不采取协调行动,调动必要资源和政治意愿,这使满意地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其结果是人们对联合国感到失望和失去耐心。这可能是因为最终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是最后在联合国框架外采取的,就象科索沃的情况一样。或者这可能是由于商定的措施不能满足具体的需要,就象我们在东帝汶看到的那样。这甚至可能是由于象安哥拉的情况那样联合国再次面对众所周知的具有灾难性规模的冲突,而国际社会未能及时处理这种冲突。

为什么某些困难局势引起大力调动各种办法和手段,而其他局势则没有?为什么世界某些地区的苦难比其他地区的苦难引起更大的愤慨?安哥拉困境和东帝汶困境提供了两个醒目的例子,这相当于一种明显的,片面和不平等的注意的模式。

在安哥拉,安盟拒绝遵守《卢萨卡议定书》,并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这可能再次引起象过去一样激烈的同样的内战,这场内战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在该国给数以百万计的人,特别是给无助和贫困的人造成难以估量的痛苦。

在同巴西享有特殊联系的安哥拉,尽管国际新闻报道有限,然而国际社会却直截面对着一项巨大的政治挑战及一场规模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需要采取紧迫和优先行动。安全理事会不能再象以往的情况一样,让其决议受到公然的忽视。

同样紧迫的是联合国现在积极参与的帮助保障东帝汶人民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的任务,这一决定在自由的投票中已明确无误地表示出来。同东帝汶人享有语言、文化和历史纽带的巴西社会,同他们一道对投票得出的令人瞩目的要求独立的定论欢欣鼓舞。巴西对东帝汶的兄弟们受到的暴力以及随后发生的无辜者丧生的情况感到惊愕。

巴西无法接受、巴西公民也无法理解的是: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未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所授权的多国部队——巴西从一开始就决心参加——将制止全民投票以来所犯下的暴行,并将能够重新建立向独立和平过渡所需的条件。

在过去十年中,长期被认为是落后和独裁之乡的拉丁美洲,通过它所经历的变革而为自己塑造了新的国际形象。我们各国恢复民主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在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方面的重要成就也起到了作用——尽管仍需做大量的工作。采取始终如一的经济政策的作法,得以克服我们一直陷入的无止境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并结束了给我们公民带来过多的不稳定性而非正义性的螺旋式通货膨胀。

毫无疑问,我们在整个 1999 年中所经历的时有时无的困难,不会使我们失去信念并放弃成就。今年初,在几无或许几个星期中,一些人把巴西称为“拉丁美洲的病夫”。他们认为我们可能会在滑回高通货膨胀的陷阱,会经历深刻的衰退,和再次诉诸刺激短期增长的万灵丹并返回过去古老的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然而我们到本世纪末使通货膨胀率为 8% 以下。我们充分预期走上高于 4% 的持续年度增长之路,并预备经税务、财政和社会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改革而完成大规模的现代化计划。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为我国成为现代化的、经济上健康和具有活力的、以及更具社会正义和政治成熟的国家奠定基础。

随着民主的到来,巴西和阿根廷发展了把我们人民连在一起的牢固友谊,并在短时期内建造了一座一体化的永久丰碑。我们在核合作领域中的双边协议是出色的,也是该区域及全世界的稳定力量。我们两国同巴拉圭和乌拉圭一道建立的、以及玻利维亚和智利等民主国家与之有联系的南锥共同市场,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半球以及实际上全世界的经济面貌。我们的一体化进程不是针对任何人的,相反是争取加强美洲内部及以外的历史纽带。我们各国单独地并在南锥共同市场的框架内,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力求使国际贸易体系走上更开放和平衡的道路,它不再帮助和纵容常常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主义特权。

民主使拉丁美洲各国在一旦出现共同认为是它们之中的一个国家的体制稳定的威胁时,能够在无不当和未经要求的外部干涉情况下并本着合作的精神提供相互帮助。本区域各国因为有了民主而成功地解决了长期破坏这一更和平和稳定的大陆上和谐的争端。去年底,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外交支持下,于巴西利亚签署了结束其长期边界争端的协定。这样,拉丁美洲尽管有各种困难,却正使自己变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成为一体的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实体。

正是本着这种一体化精神以及我们都属于一个家庭的永久意识,巴西感到同正在本区域展开的各种更新努力密切合拍。定于今年 10 月在阿根廷举行的选举无疑将肯定我们这一伟大邻国的政治活力并保障稳定和振兴的增长所必需的经济条件。我相信,同样的积极展望将在今年于智利和乌拉圭以及明年在墨西哥举行的

选举中实现。其结局肯定将突显拉丁美洲的民主特点。

玻利维亚自 1980 年代以来在克服 20 年前似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成就,进一步表明了本区域如何变得更美好。秘鲁也通过其在扭转过去几十年的不利经济趋势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战争中的巨大成功,而赢得了国际承认。这种克服障碍的能力同样显见于厄瓜多尔,该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将通过民主和立宪的渠道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解决目前的危机。巴拉圭则在今年初成功地处理了一次微妙的政治危机,并且正沿着民主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稳固前进。巴西一如既往,将继续果断地支持巴拉圭的这种努力。

圭亚那不仅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对坚持和促进民主价值的承诺,而且同样体现了激发我们的一体化精神。我们希望,苏里南将加入本区域实现这些积极变化的努力和成就。委内瑞拉正在经历的变革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注意。这种变革进程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它清楚地及合理地反映出委内瑞拉人民对更新的愿望。通过立宪的方法而表现这种愿望,是对正在进行的变化将走在尊重阐释民主的准则、权利和责任的轨道之上的最佳保障。

巴西还相信,哥伦比亚的安德列斯·帕斯特拉纳总统的政府将坚持其使这一亲密的国家实现和平的努力。不当的外国干涉只会加重已经复杂的局势,这一局势应由哥伦比亚人自己解决。

我们所相信的邻国的成功,决定着巴西人民及其政府在解决自己问题及战胜自己既众多又巨大的挑战方面的成功。

今天,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贩运对民主社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它们显然标志着对国家体制和公民的直接严重威胁,这些公民以自己的生命而为我们时代的这一灾难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小型武器储备的激增和交易,同有组织的犯罪和毒品贩运密切相关。巴西由于自己的公民的生命每日都因违禁的火器而处于危险之中,最优先注意解决该问题。我们在区域一级批准了重要的《美洲国家关于获得常规武器的透明度的公约》。我们希望大会赞同举行一次有关非法武器贩运的各个方面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同样,巴西极度重视正在就打击跨国的有组织犯罪的公约草案所进行的工作。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继续存在,仍然是对安全甚至人类生存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该坚定地谴责违背不扩散制度目标的一切行动。同时,核武器国和临界国应该采取行动,逐步彻底和不可逆转地消除核武器。为此,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将在本届会议上再次就一项新的核裁军议程提交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谋求为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对话铺平道路,并以对核裁军进程性质的务实均衡评估为基础。

我们各国的民主体制和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今天都面临着重大挑战。我们各国每天都遇到经济困难和严重的社会不满,例如贫穷和极度不平等,从而使人们更加不法忍受:不法忍受经济无法以同加速改善社会福祉相适应的速度增长;不法忍受易受危机和国际市场动荡的伤害;并不法忍受有时似乎对公民的合法迫切要求回应缓慢的政治进程。但是,必须通过民主渠道表达和指导这种集体焦虑。

巴西对民主体制和法律至上的承诺也适用国际关系。去年10月绝大多数巴西选民选举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连任,他在第二届任期一开始就明确表明:

“法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国际秩序基础,如果接受单边主义和使用武力为国际关系的组织原则,则从长期看,支持强权政治工具而非努力建设秩序和遵守法律就将更为合理。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出现真正的新型世界秩序,则该秩序的基石之一就必须是承认,多边体制——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是保证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行动合法性的源泉”。

我们各社会再次越来越焦躁地期待看到多边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奋起迎接这样一种挑战,即在建立一个适应整个人类共同期望和价值观念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有意义——实际上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面的道路要求振兴和变革。如果世界各国政府渴望有一个强大有效的联合国,它们就必须不仅改变对联合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还必须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改变联合国。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南非共和国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南非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南非共和国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南非共和国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阁下来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姆贝基总统(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并以不结盟运动主席身份,衷心祝贺西奥-本·古里希布先生你当选大会主席。我还要感谢你在担任这一崇高职务时对我国所说的友好话。

我们在一起共同工作了数十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你的政治家才华,我们作为邻国和平相处,并平等地携手确保我们两国人民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经验令我们相信,你将履行你作为大会主席的责任,帮助人类使我们的共同世界成为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更美好的场所。

令我们高兴的是,你将同秘书长科菲·安南一起工作,他已不容置疑地展示对实现联合国目标的承诺。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给我们大家提供了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的前景。这两份文件在获得通过时表明了各国有决心确保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崛起所造成的灾难绝不重演。我们今天对此加以回顾,因为我们认为,现在应该采取果断措施,在我们大家分享的共同世界中确保这两项文书贯穿在一切现实之中。《宣言》前言中的措词表达了这两项文书共同载有的重要信息:

“各联合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我们认为,我们大家现在应该确保共同努力,以符合这个观点的方式重建人类社会。我们进一步认为,我们所说的话对那些现代担任政治领导职务的人,即那些同我们一样有幸在大会发言的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挑战。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是否有合乎道义的明智勇气奋起迎接这一挑战。

但是,我们感到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有条件使我们能够成功地谋求我所提及的联合国文件载有的那个前景,供不应求的可能是政治家的勇气,而不是滔滔不

绝的动听词藻。我们谈论的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冷战已经结束,任何地方都没有迹象表明超级大国在进行为保护自己而摧毁对方的意识形态驱动的竞争。的确,有些国家仍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这些武器构成了威胁。处理这个问题唯一合乎逻辑的办法是积极谋求普遍裁军和销毁此种武器。

第一,我认为,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民主治国的方式。各国都从其本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扬弃了专制,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存在这样的专制,或今后没有人企图建立专制。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些例外只证明常规所在,而没有证明我们努力促进的主张不成立。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应该导致至少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任何国家都应该没有必要谋求建立势力范围,把它作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所谓必要条件。

第二,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持续存在要求各民主国家的普通人民都感到切实享有决定其命运的权利。换言之,不能因为其他某些更强大的国家发号施令,就要求任何国家限制行使这一权利。

第三,这些情况造成建立以更加民主的国际治理体制的可能性,正确地改组本组织就将反应出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全球化的进程必然重新界定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实践。这一主权的疆界正在退缩,尤其是对世界上较小的国家,如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展开一次补偿运动,通过国际关系体制的民主化来加强这些国家对全球治理体制的影响。

我们谈到的这些发展也意味着,根据我们各国的行为,人类今天或许面临实现持久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空前光明的前景。民主在全世界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各国间进一步承诺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和国际冲突。

我相信,现任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在大会发言时,将报告非统组织最近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作出的重要决定,即从下届首脑会议起,非统组织将开除非洲大陆上可能仍然存在的所有军人政权。会上进一步决定协助这种国家坚决走向民主政府体制。

我们所谈的这些发展将意味着,本组织有责任特别注重《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款中提出的目标,即

“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

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我们认为,这就规定了联合国一项庄严和最高责任,努力防止冲突并设法解决冲突,以便建立持久和平。有时,我们对冲突的反应是等他们发展成暴力,甚至战争,然后才通过昂贵的维持和平行动来干预。这些干预也冻结了这些冲突,使两级化状态长期存在,并使它们的及时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而且,因为联合国需要进行这种干预以防止敌对行动的暴发,因此联合国就有义务让政府和人民看到,它是一个真正不偏不倚的调解和调和者。要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就必须象《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所述,名付其实地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间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之友好关系”。

如果我们确实认真承诺实现这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没有借口允许进一步推迟对联合国进行有意义的改组。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就会承认,现在阻碍进展的是想要容纳所谓新的实力关系,通过以修正的形式在联合国内使不平等的关系重新制度化的愿望。其根据是这样一种论点,其这些关系的制度化比本组织尊重国家间平等权利原则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

在冷战和许多国家独裁统治的局势下,强权政治或许可被当作求生的唯一道路。然而今天,用行使这种强权的办法来管理世界,不论这种强权如何改头换面,其本身就会颠覆民主与和平的目标,并造成妄想取得全球、各大洲和区域霸权的野心家。

联合国在着重预防冲突这一重要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如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执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规定,在面临地雷问题的国家中排除地雷以及控制小型武器的扩散等问题。当然,这些建议都不否认联合国需要用一切必要力量采取行动,帮助结束它受理的所有现有冲突,其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西撒哈拉、东帝汶、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科索沃和其他地区的冲突。

我们开头引用了一段《世界人权宣言》,其中讲到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社会进步并确保人人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强调有条件实现该《宣言》中所阐述的各项目标。继续影响全世界几十亿人口的严重的贫穷、无知和疾病构成对我们已经承诺的人的

尊严与价值的直接否认,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也能同意,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各国国内和各国间的不平等状况也日益严重。我们也已看到,短期资本的流动如何在某些国家产生灾难性经济后果。

如同和平与民主的挑战一样,我们坚信,世界经济有足够的资源切实解决《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社会进步和人人享有更美好生活的问题。此外,科学和技术如此继续发展,加上世界经济中资本大量集中的特点,人们难以相信人类社会没有必要手段,对贫穷、无知和疾病施加应有的影响。确实可以相当理性地说,国际和平、民主与繁荣是世界经济进一步迅速增长,以及各大小公司随之进一步扩大的必要条件,这些公司需要全球性市场。

同样,咨询和通讯技术的革命,作为全球化进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既使我们能够实现也要求几十亿人类居民有更高的教育和生活水平。然而,很清楚,市场运作中没有自动或内在机制使资本和技术能对世界所有国家产生我们所谈的这种影响。不应以为,我们这样说,就意味着我们藐视所有那些有关每一个国家应该做些什么,以创造有益于谈判和技术转让的条件的话,也不能认为我们要重开有关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作用的辩论。我们现在说的是,市场的运作并不而且不能排除为增加经济机会和为提高世界上许多因贫穷的祸害而被剥夺了人的尊严的人的生活机会而主动进行干预。

英国作家查尔斯·利德比特在他令人感兴趣的《在单薄的空气中生活》一书中写到:

“新的(以知识为动力的)经济需要有号召力的远景和机制来使其成为现实。我们的机构正在通过改革、重组和改组,一点一点地变化——但这一进程实在太慢、无规则和零星的——它必须变得更加自觉、更富有想象力、更加彻底。”

同样,问题在于政治领导人是否愿意在他们当中实际寻找采取正确和必要行动的道义和思想勇气。正确和必要的行动还要求我们也要在影响社会经济问题的这一领域,审查所有多边机构的运作,包括属于联合国大家庭的机构的运作。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确保这些也能够反映国际治理体系民主化的极端必要性。

我们先前提到的联合国文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重新创立一种新思想来指导我们采取行动,建立一个确认人的

尊严和价值的新世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必要的行动来落实我们所阐述的信仰。

我们所谈论的是将实际解决涉及和平、民主和发展的有关问题的行动。

我相信,这一实际行动纲领不仅将满足我们所属的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成员的愿望。它也将顺应发达的北方国家人民的最深刻意愿,因为冲突、压迫和贫穷对他们没有好处,即使它们发生在这些国家边界以外的地区。

无需指出,我们所实行的民主制度还要求我们通过大力进行宣传来争取选民支持应构成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行动纲领的内容。

人类社会的发展给将站在这个讲坛上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以推动全球朝着实现穷人和无助的人们日夜梦想的一种新现实向前迈出一大步。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那么我们就辜负了那千百万人的期望。不要让后代说,由于懒惰势力,我们未能采取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南非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南非共和国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发表讲话。

布特弗利卡总统(以阿拉伯语发言):非洲通过他的两位最富于奉献精神的杰出儿子,特别荣幸地领导联合国向新的千年迈进。主席先生,我指的是你这位来自姊妹国纳米比亚的优秀自由战士;我此刻要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大会主席。我所指的另一个人是我们的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国际社会感谢他在促进《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毅力和热情。

能在大会这里发言,我感到非常激动,因为大会在25年前选举我担任第二十九届会议的主席,那时就表现出了对非洲的敬意和兴趣以及对所有数代自由战士的关心。这些自由战士与我国的自由战士一样,担当起了对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历史重任。二十五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不可阻挡的自由运动滚滚向前,摧毁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并且维护了各国的主权平等和各国人民的发展、自决和独立权利。

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局面,其特点是各国间更加相互依赖。由于各国逐渐地越来越意识到其命运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再也不能执意孤立自己,或者在其中一个国家发生某一事情的时候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因此,在我们这届会议选择把和平和非暴力文化作为主题的时候,我来到这里是代表非洲和阿尔及利亚阐述这一共同的命运。在本世纪整个阶段,世界不断对自身进行发展、创造、摧毁和改造,并且向前迈进。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经济危机,政治紧张状况以及破坏性战争,但人类以不可阻挡地朝着一个共同的历史——朝着一个共同的命运——前进。

意识形态的斗争出现缓解、冷战已经结束而且一个必然带有发展方面矛盾的单级世界已经出现,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着新的挑战。

其中的挑战之一是今天所称的全球化:一种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制度、甚至全球价值和愿望——而且还有全球问题和危险。无论如何,全球化的落实正面临种种障碍和阻力。在经济方面,各国间的不平衡发展对于建立能获得普遍接受的新世界秩序并没有帮助。正在出现令人忧虑的差距,尤其是在非洲: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债务负担沉重不堪;骨肉相残的冲突;环境退化;失业增加;流行病长期存在;在校儿童人数减少;官方发展援助减少以及直接投资额少。此外,三分之二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四分之三的低收入国家是在非洲。并且非洲大陆50%的人生活在赤贫中。

第三十五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首脑会议表明,非洲人已准备好通过努力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以及通过更坚定地加强政治和经济改革来对付这种不幸的局面。但首脑会议还说明北南合作是多么软弱,表明这种合作往往受到基于既得利益或有选择的干预的政策限制。

首脑会议还指出我们各国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固有困难,由于机械地照搬在发达国家采用的标准而造成许多误解,不仅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如此。

因此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解决,国家社会每天都在非洲、亚洲、巴尔干和中东看到这些问题。除了这些问题外还必须加上这两类人之间的全球性争议:一些人支持乐观的普遍性观点,这种观点轻易地容忍单极世界的出现和调整,另一些人则保留自己的归属感,正确地认为人类的利益在于建造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对和谐的全世界的希望只是空想:这些问题只代表着我们知道是无可避免的演进过程中的障碍。然而,将成为幻想的是那种无法实现的全球化,那种无视整个人类合法利益的全球化,因为它注定迟早要失败。各种问题全球化是一种生活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找到全球解决办法。

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富国与债台高筑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是多么令人沮丧,对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当然不想向大会抱怨其态度和做法至少是20年前的、现已过时的“第三世界主义”造成的许多混乱。世界不再是1970年代的世界;世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在我看来,应该继续和鼓励这种走向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趋势,并同时应走向团结。事实上,我认为是二十世纪特点的强权与对抗的逻辑应让位给团结的逻辑,后者将在公平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基础上使国际关系更具人性。

如果我们只限于通过市场谋求繁荣,那么繁荣将是不完全的。我们还必须继续通过促进最基本的人权来谋求繁荣。在交流关于人权的观点时必须清楚地表明,人权的定义以及对人权的遵守必须考虑到我们有关不同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优先秩序的各国的具体情况。对我们来说,人权要以公民的义务予以平衡,并受到无可避免的优先秩序的制约。除了为消除贫困、疾病和文盲而斗争、确保人人过上象样的和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外,人权难道不意味着保护社会不受恐怖主义、贩毒者以及造成各种死亡者的伤害?在这方面,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我们的关切与发达世界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事实仍然是,这些是最重要、最优先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人类进步以及人类通过采取自由市场规则、投资自由以及其他自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观点不能与人类通过发展援助以及同第三世界团结一致来取得进步分割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应着重

注意继续在联合国系统内采取国际行动,以便使国际行动适合新的世界局势,使它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正当愿望,并在实现和平、稳定、平等与共同繁荣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我来自大陆的人民需要对正义有信心,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剥削了他们的资源而获得自身发展的国家对它们欠下了沉重的债务。他们需要相信,他们在为人类的现代文明做出如此多的贡献后,有权利要求其尊严和人性得到尊重。我还谨提醒大会注意,如果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允许贫困扩大,那么富有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就将为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出现动乱敞开大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将越来越容易受到暴力、冲突和混乱的威胁,这将不利于民主和经济活动。

我还谨回顾,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未能让人们听到它们的呼声——这反映在乌拉圭一轮会议的结果中——对解决我所提到的所有各种问题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我们的倒退是否意味着我们必将走下坡路,意味着大多数人贫困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世纪的特点?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我宁愿相信只要同联合国的行动一道采取协调一致和持续的行动,就可能实现复苏。

第一层在于工业化国家,因为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办法掌握在它们的手中,正如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十多年前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它们有充分的经济、财政和立法手段,用来发起改革,并恢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环境。

第二层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这些国家必须安排自己进入世界经济,并将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行到底,以此承担成为自力更生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不幸的是,它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洲人今年7月在阿尔及尔集会,在那里举行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三十五届首脑会议。在这次与会者人数空前的会议期间,非洲人评价了它们自独立以来取得的成就,根据外部势力和内部现实,估量了目前的各项改革,并为对非洲未来的新办法和新观点打下基础。优先考虑的是非洲的和谐与和平。非洲决心加快解决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以及在大湖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境内的各种冲突。已在非统组织和各分区组织内加紧活动,以便恢复和平并结束难民的苦难。

同样,非洲已明确指出,它支持国际法制、民主和尊重法律,因此它为非洲统一组织对安哥拉和西撒哈拉境内局势的立场规定了指导方针。它充分支持联合国在

那里的各项主动行动,如同它支持非统组织在科摩罗的斡旋一样,在那里它希望科摩罗人民将为他们的机构进行民主选举,以便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对和平与和谐的关切也成为非洲对中东和平进程评估的基础,非洲希望该和平进程将在以色列撤出被它不公正占领的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基础上,取得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非洲还同样关切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应解除那里影响人民生计灾难性的经济制裁,同样也应解除尽管两国政府已充分与有关的调查进行合作但仍不公正地对利比亚和苏丹实行的制裁。

人类必须消除因现在行将结束的受折磨和悲剧性的世纪的多变多端历史而产生的各种争端而进入新的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消除紧张局势的温床和危机。无法行使其自决和独立权利的人民的苦难必须结束。必须如非统组织秘书长所说的那样,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危害较小的方式来解决对伊拉克人民实行的禁运。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贩毒和贩运武器必须成为最高优先事项,因为它们损害国家间的关系,并削弱和平的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还应优先考虑新的、合乎道德的国际关系,以便迎接和平与共同繁荣昌盛的新纪元。

但是,阿尔及尔首脑会议并不仅限于明确表示非洲希望结束正在使它四分五裂的各种冲突的悲剧性阶段,它同时希望一步一步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在世界各地确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首脑会议还研究了在《阿布贾协定》框架内的各种经济和发展问题,通过重振持续发展,并通过非洲统一框架内区域一体化这项苏尔特特别首脑会议刚刚体现的原则,来巩固宏观经济改革。

苏尔特首脑会议重申了非统组织在必须最后解除对利比亚实施的不公平的禁运方面对兄弟的利比亚的声援和支持。它还决定确立新的规则和准则,促进为非统组织发展各种运作结构和模式,以期实现非洲各国之间的有效联合。这种联合将保障非洲的安全,并加强其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这将使非洲赢得其应有的尊敬和地位。鉴于非洲在整个历史上在殖民时代的各种牺牲、奴隶制、剥削和掠夺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种联合还将促进非洲的物资和人力潜力,而所有这些使它变得与世界其他地区如此的不同。简而言之,苏尔特首脑会议充分重申非洲有权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组成部分。因此,正义将对所有的人平等,全球化所引起的新概念将没有任何形式的不公正、滥用和排斥。

首脑会议还确认必须在联合国和非统组织在所有领域内的合作和伙伴关系的背景下推进各项新的改革。最后,首脑会议为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道德理念,其中生产和竞争的要求不应妨碍其生存本身正在受到各种环境恶化和影响自然世界、人类和人的价值及机构的各种祸害威胁的人类的更高的利益,也不应该影响国家对其完整和主权的权利。

我们不否认北半球公众舆论有权谴责违反人权的行为。我们也不否认联合国负有责任帮助正在遭受苦难的人类。但我们依然会对任何损害我们主权的行为感到极其敏感,这不仅因为主权是我们反对不公正世界统治的最后防御,也因为我们不能积极地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决策进程或对决定执行情况的监测。

此外,由于主权国家毫无疑问依然是社会契约,而且是人权—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应在其中安排的地方,因此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以及和谐和民主的文化。但只要是真正的处于危机状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未得到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些将依然是一个梦想,因为如同其他各大洲一样,对非洲而言,这些问题是这一事项的关键。

因此,关于对内部事务干涉的概念的辩论,似乎远未结束,因为它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得到确切的回答:第一,援助与干涉的分界线在哪里?第二,人道主义、政治和经济问题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第三,干涉是否仅在弱小的或被削弱的国家中有效,还是应不加区别地对所有国家都有效?

无论如何,我们坚信,只有在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干预其内部事务。我们坚信,只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给予声援、忠实地提供援助和给予关注,南方各国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困难。

阿尔及利亚为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其它非洲国家一样,阿尔及利亚必须承担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巨大社会成本。阿尔及利亚已经开始一项庞大的国家复兴项目。阿尔及利亚正在努力保证民众和谐、加强民主、建立法治以及复兴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并使其现代化。简而言之,在一个已经恢复和平、所有人的自由竞争、正义和尊严都得到保证的社会里,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条件,最充分地利用我国的经济潜力,并且促进个人和集体福祉。

我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因为我国经过了十年的磨难,这种磨难除名义上

之外,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这场战争使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得以侵害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尊严和人民的良知。我国正从这些悲惨事件中缓慢地恢复过来,这些事件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对于这场席卷我国的磨难,在许多论坛上发表了许多意见——不幸的是,发表意见人往往对我国持敌对态度,或者对阿尔及利亚社会及其问题只有肤浅的了解。我不想在这里谴责任何人的意见,但是我相信,当一个民族在整整十年里经历了象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所经历的悲剧后,当这个民族以阿尔及利亚人民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精神面对这场悲剧后,那么这个民族至少有权利用其共和国的机构为自己辩护。

不错,我国受到伤害——我国儿童身心受到伤害。数万儿童死亡——有些是被狂热主义所害,有些则是被其他人的疯狂行为所害。一般而言,人民是被总的混乱局面所害,这场混乱几乎使共和国垮台。因此,阿尔及利亚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捍卫自己的生存。

在这种激情奔泻,失序、杀人意识、社会被边缘化、破坏性的虚无主义以及流血和流泪的环境中,男子、妇女和儿童都经历了无尽的痛苦,我国基础结构被公然和盲目地破坏,给我国经济带来极为消极的后果。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仍在舔舐自己的伤口。我国复苏的主要动力是民众和谐;这表现了我国人民固有的大度和我们对崇高的容忍价值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价值观是真正伊斯兰教义的特点。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拒绝暴力,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传统。阿尔及利亚人民一如在争取独立和建设祖国时期,致力于促进极为重要的人权。他们在9月16日公民投票中以响亮地“支持”议会7月通过的民众和谐法案,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还通过向那些曾经藐视社会和共和国法律的人打开自己的心扉,向他们慷慨地伸出自己的手,证明这一点。他们还通过依靠法律来证明这一点,而法律本身也日益受到崇高的法制理想鼓舞,而且没有压制性,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破坏这些法律。他们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忠于自己,他们知道只有和平和团结才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

我们在国内也坚决努力执行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建议的各项原则。随着和平恢复,我们将加强所有自由。我们将不可逆转地建立民主和多元文化。我们正在非

常积极地努力消除全国所有阻碍私有经济活动的官僚障碍,同时努力建立社会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法则。

在区域一级,我们目前正在就一项联系协议以及巴塞罗那进程与欧洲联盟谈判。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重新发起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项目,建立这个联盟的基础是新思维、理智行动和现实目标,这个基础的目的是保证建立一个可行的、可靠的和持久的机构。与其他国家一样,阿尔及利亚将继续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进行谈判。在非洲方面,阿尔及利亚将不断努力,促进在非洲统一组织框架内达成的各种经济一体化协议;解决使非洲大陆四分五裂的各种冲突;并且促进持久和平,这有利于持续发展。

简而言之,阿尔及利亚认为,为了积极促进世界未来、和平解决冲突、国际稳定、国家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平等,阿尔及利亚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使其经济运作的总框架现代化、得到加强并自由化,鼓励私人投资,保障所有公民机会平等,与此同时保障所有公民的人的发展。我国将采取这种全面而有条理的行动,以适应这个世界,争取获得成功,同时在世界各国中赢得自己应有的地位——由于我国历来支持本组织的理想,我们本已赢得这种地位。

阿尔及利亚在缓慢和稳步地恢复。阿尔及利亚已进入恢复期。阿尔及利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人民有潜力、活力和精力,而且也是由于得到全世界许多姐妹国家和朋友的支持。请允许我在这个讲坛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这种支持的感谢和赞赏。

我们即将走完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即将走完一个千年期,进入另一个千年期。有人认为,我们时代的这些里程碑对于人类的生活和演进将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种看法。

二十世纪有其光辉的时刻,特别是结束了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以及消除种族隔离。但它也遭受到挫折和失败,这体现在不发达现象持续存在、消除贫困的斗争并非总能取得成功以及需无休止地谋求改善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

这些历史性的事件是否足以激励我们扭转那种僵硬地按照已过时的国际生活概念行事的趋势?我们是否能够相互伸出兄弟之手,以便在世界上更好地共享各种福祉?我们是否能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比我们

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能够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我正是用这些充满希望的乐观话结束我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阿尔及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聆听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努乔马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联合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充满困难和挑战的14年里,你为争取我国人民的自由和我国的独立在联合国英勇地展开了一场外交斗争。对你崇高的个人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来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纳米比亚共和国人民看到你主持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感到非常自豪。我谨代表纳米比亚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对选举你为本届会议主席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深表感谢。

主席先生,你担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是沿着突尼斯的蒙吉·斯里姆、加纳的亚历克斯·森森-萨基、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哈迈德·萨利姆、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尼日利亚的约瑟夫·加尔巴和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留下的值得纪念的脚印往前走。这些杰出的非洲儿女们在1961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大会主席。他们使非洲感到自豪,他们出色地为国际社会服务。你应听取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观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这样,你就能维持甚至进一步提高大会这个联合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的尊严和重要性。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纳米比亚代表团将始终忠实地和毫无条件地给予你支持。

在你任职期间,你身边还有一位杰出的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非洲之子,科菲·安南先生,他来自加纳这个点燃了非洲非殖民化火炬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先生,我谨向你表示我国政府给予你最充分的支持。纳米比亚政

府和人民特别赞扬你坚定不移地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并为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民减轻苦难。

我谨表示赞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我的兄弟和同事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总统的讲话。他向这个机构提出了非洲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并表达了非洲人民要应付非洲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决心。布特弗利卡总统按照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精神,谈到了一个面临各种发展困难的大陆,这个大陆的人民并没有失去希望:这是一个勤劳的人民,但他们使非洲发挥自身潜力的努力受到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阻碍。我正是希望谈一谈其中一些挑战。

今天,经济差异、债务负担、社会不公正、失业、难民问题和环境退化已成为世界各区域令人难以接受的困难。人们可能会问,这些贫困负担是否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现状?

我们是否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教育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妇女、男子和儿童,使他们保持健康并具有生产力?是否能将我们现在能动用的所有技术成就用来为全人类服务?有人讲出了言之有理的话,说今天富裕的人应将他们的明天归功于现在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

有人认为,解决不发达的办法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这迫使我们大家都平等,而事实上,我们并不平等。我认为要使全球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使它从仅仅是概念变成现实。它必须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一种集体事业。合乎逻辑而且事实上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是,不应有任何男子、妇女和儿童挨饿,而其他人在繁荣中享乐。全球化不应等同于受保护的有选择的繁荣。如果是这样,将会危及国际和平与稳定。只要超过十亿的人生活在赤贫之中,缺乏享用清洁饮用水的机会,而且完全不会读书写字,那么全球化的益处就将不是普遍性的。国家不平等的现实必须成为对世界经济的任何讨论的中心。联合国可以而且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最大限度地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

二十世纪最大的威胁是令人难以接受而且不断加剧的贫穷,这种贫穷剥夺了人类的尊严。我希望回顾,在1995年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期间作出的承诺之一,是到2015年时将贫穷的程度降低一半。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非洲撒哈拉以南就需要有7%的年增长率。前景看来很暗淡,但消除所有的不平等并获得成功的决心却很坚定。

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只生产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外国直接投资估计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大多数在非洲,因此这一辽阔、富饶但不发达的大陆继续在向本组织提出挑战。在描绘非洲许多地方的形势时,贫穷和疾病是被谈论得很多的问题。非洲各地的武装冲突继续在剥夺非洲大陆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使非洲继续取得的总体成就黯然失色。非洲今天正在民主化,并正在进行经济改革,以便使非洲人民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和经济繁荣。而事实上,为数很多的国家已有了一些明显的经济增长。

但是,政治和经济改革本身将不会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对补充这些改革并维持现有的增长速度都十分重要。只有到那时,非洲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我要强调的是,外国直接投资不应替代官方发展援助。在短期内,外国援助将是对非洲为其人民的复兴和发展而作出的本身努力的一种必要补充。

1990年,我以纳米比亚共和国新当选总统的身份出席了在联合国这里举行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我感到自豪的说,我国是非洲第一批完成执行首脑会议结果国家行动方案的国家。我国议会批准了事实上非洲大部分国家也都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而我们将要纪念该公约的10周年。这体现了我们在确保儿童实现其充分潜力方面应遵守的法律标准。但是,使我们失望的是,太多的儿童现在得不到他们的童年。

在一个儿童遭受武装冲突,而每一种权利都被夺走的时候,这个儿童就与成年人处于同等的地位。然后,在产生这一进程时,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已降低到它最低的水平,因此人类的其余部分不能够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防止发生冲突,以便建立一个所有的儿童都能在安全的条件下在其中生活、游戏和成长的环境。只有通过一种和平的文化,我们才能够反对所有形式的对儿童的剥夺,特别是制止儿童当兵的现象。

因此我要强调的是,由于有地雷而不能进入的每一平方公尺的土地都应再次成为有生产力的土地,许多儿童,特别是在非洲的儿童,应不再挨饿。如果非洲的每一个携带枪支的儿童兵都能变成学生,那么非洲的前途就将得到保障。

在新的千年的前夕,我们都可以自豪的回顾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已经在朝改善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信息高速公路已

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现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已通过因特网充分地连接在一起。

虽然如此,非洲许多地方在获得有实际意义的知识和信息方面仍然非常困难。除必须进行努力实现“联线”外,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一项巨大挑战——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保证我们各国无2000年问题,以避免任何灾难。纳米比亚呼吁那些有资源和必要知识的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分享知识,因为这相互有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信息技术只会有利,不会有任何损失。

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个大流行病正在侵蚀许多非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和发展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将艾滋病毒/艾滋病视为头号杀手。我国政府为1999-2004年制定了一项全国战略计划。我国全国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努力进行预防和控制,使艾滋病毒/艾滋病发病率大幅度减少。除现有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各区域方案之外,我们还采取其他措施,保证不对带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有任何歧视。国际社会应该协助非洲各国政府努力执行其国家方案,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

明年6月,大会将召开两次特别会议,审查各国政府执行分别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所作承诺的进展情况。让我们利用这些机会,使人民的平等成为现实,使融入社会成为常态,使男子和妇女可以平等和作为伙伴共同生活。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裁军领域取得了若干积极进展。然而,虽然取得了这些进展,我们对核裁军这个核心问题缺乏明显进展感到关注。这里的中心问题是,核武器国家虽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着各种义务,但仍然决心永远保留其核武器。它们这样做的借口是它们需要核武器保障国家安全。提出这种要求显然就是让其他国家以同样借口获得核武器,因为本质上每个国家都需要保护其重要的国家安全。实际上,核武器还被用来作为手段,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和进行讹诈。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该垄断核武器。这是一种新型的种族隔离,这在今天是无法接受的。

在本世纪,少数人由于犯下了滔天罪行,侵犯了人类的良知,以其野蛮行为,挑战国际和平与安全。纳米比亚谨表示坚决反对所有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行径,重声明确地谴责这些行为,并将此记录在案。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上,非洲人领导通过了《非统组织防止及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因此,消除恐

怖主义需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密切合作。但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的合作以及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必须以国际法和有关国际公约为基础,最重要的是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加强和重振联合国并使联合国民主化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组成没有反映联合国会员国大量增加的现实。而且,这种组成没有尊重公平地域代表原则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在目前的安全理事会中,特别是在常任理事国类别方面,发展中国家代表严重不足。维持这种状况就是破坏民主和公平原则。同样,有选择性地或不完整地改革安理会也会忽略公平和平衡原则,这是违反《宪章》精神的。

因此,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立场:我们必须纠正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方面现有的不平衡现象。安理会必须成为一个民主的、真正有代表性的机构,并且摆脱过去的公正倾向和做法的束缚。

我们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两个类别。在改革后的、民主化的安全理事会,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足够的代表。在扩大后的安理会,非洲至少应该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多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纳米比亚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纳米比亚认为,改革后的安理会成员国应不少于二十六个国家。有些人以效力为理由,主张成员国数应少于上述数字,我们不支持他们的主张。

经验表明,安全理事会无成效或无作为主要是因为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使用否决权的威胁,而不是因为安理会成员数目。纳米比亚作为一项政策反对否决权,因为否决权是不民主的。甚至不能象在民主国家那样通过法律或程序来推翻否决。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成员之间的分歧长期存在。在一些情况下,否决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安全理事会的分裂和无所作为。在另一些情况下,否决权甚至延长了冲突和人类苦难。如果现在不能废除否决权,则应该逐步限制否决权,直到完全消除否决权。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只有恢复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才能有持久和平。我们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之间恢复和平谈判表示欢迎。我重申我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坚定不移地支持在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

将近十年前随着冷战结束,我们都希望分享和平惠益。在这方面,令人遗憾的是,古巴继续受到残酷的经

济、财政和商业禁运,必须立即取消这些禁运。纳米比亚呼吁结束对古巴人民的禁运,以使古巴人民能同他们的所有邻国一道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

东帝汶人民长期以来可望获得自决权、自由和独立。1999年8月30日,他们在全民投票中以压倒多数表达了他们要决定自己未来的梦想。国际社会应援助东帝汶人民完成建立国家、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的进程。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通过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邀请国际社会前往东帝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呼吁印度尼西亚给予全面合作,以确保这项行动的成功。

关于西撒哈拉,我国政府注意到在举行一次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呼吁各方,特别是摩洛哥王国,与联合国合作,以使撒哈拉人民能够行使其自决权。

尽管联合国面临种种困难,但我国政府认为本组织及其各机构是促进世界和平、国际贸易和加强合作的最好工具。接纳基里巴斯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为会员国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组织。纳米比亚向这些国家表示祝贺,欢迎它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目前的国际气候下,只有联合国才能给受冲突蹂躏的地区带来和平、给最需要帮助的区域带来发展以及解决国家间争端。然而,联合国要富有成效和有效率地执行其多种任务和职责,就需要所有会员国无一例外地提供资金和资源。简而言之,联合国必须体现人类的希望和愿望,并仍然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聆听格鲁吉亚总统的讲话。

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格鲁吉亚总统受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以格鲁吉亚语发言;代表团提供口译):我曾多次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清楚地记得自1985年以来我所作的每一次讲话。这或许是因为,第一,我不能设想在世界上有比这更崇高的讲台,第二,我个人的政治命运总是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使我来到这里。我上一次前来大会是在1992年,当时我已是我的国家格鲁吉亚的国家元首。那也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时刻,一个新生的独立国家将经历痛苦的诞生过程的时刻。

今天,我在一个风风雨雨的世纪即将结束时来到大会,我可以把这个世纪称为自由的世纪。这并不是因为自由已成为普遍的生活准则——令人遗憾的是这尚未成为事实——而是因为自由的概念在政治价值观念的天平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因为在我们这一世纪打垮了自由和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或许这些事件中最出人意料和最重要的是苏联帝国的灭亡,带来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和战后世界秩序。

帝国崩溃后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最初是离心力取得胜利,但后来在宗主国内就会感到有渴望收回失去领土的幽灵,并有人企图对前帝国的空间重新实行中央控制。

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恢复帝国的企图最终仍然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未能实现的梦想。历史不能倒转。但是,在当今的反动派的武库中,依然有一种机会,通过维持对前帝国各领土的势力范围,部分地、甚至是完全地回到过去的方式。在这里我并不是指利益范围,包括战略利益。以文明方式协调利益是一种正常的国际惯例。但势力范围的概念,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种时代错误。

但让我回转头来谈谈冷战和两极世界的结束。作为一个刚好参加过这一进程的人,我认为进行解释是适当的,因为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是如何和为什么发生的辩论一直继续到今天。

我并不否认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多种的和复杂的。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思维的作用,这种新思维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孕育了。我确认,如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这些具有旧思想的领导人依然在苏维埃国家之船上掌舵,那么任何长期经济困难甚至是任何“星际大战”计划都将不会迫使社会主义阵营在内部民主化,或在国际舞台上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消除对峙。

既然我提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必须向他这位我们时代的杰出人物对他的配偶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去世表示哀悼。

那个时期的新思维包含了许多因素,但我们将它总括地描述为一种旨在使政治和公众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具有人性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方面,这首先意味着按照普遍的价值观念,用以道德为目的的各项决定来替代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办法。完全是由于这种新的办法,苏维埃领域和东欧各国才能够以较轻的痛苦作出他们民主的选择。如果没有这种新思维,就难以想象要苏维埃军队撤出阿富汗,或柏林墙倒塌这一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随后的德国统一以及东欧的解放。

旧思维感到难以与新思维妥协。这两种思维不能和谐共存。此外,并非人人都接受以普遍价值观的重要性替代以阶级为基础的办法的观念。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向苏维埃外交团表达这一概念时,它引起了整个苏维埃领域各地严重的意见冲突和动荡。

是否这种情况向来如此呢?从历史上来讲,在这种规模的变革之前总是有人类思维方面变化的典型实例,这就是说必须首先产生新思维。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一个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新世界正在出现,在启蒙时代也是一样,在那个时代,平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民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

在专门描述冷战结束的历史文献和回忆录中,人们往往发现会提到胜利者和失败者。以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词语来描述这一非常复杂的有全球历史意义的事件是错误的。例如,在俄罗斯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从而为其他各国人民树立了榜样的时候,怎么能将它视为“战败者”?人们可以对以前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今天已是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其他国家提出同样的问题。

战胜冷战的功劳同样地属于以前对立阵营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以及对将人类从核梦魇中拯救出来的崇高概念的承诺。

如果我们真要谈到任何的失败者,那就是被击败的陈腐思维,而新的常识已经获胜。在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应产生思维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是二十世纪极其重大的智力突破。

思想变革的进程是长期的。停止不前等于后退。在即将进入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再次发展一种新

思维、国家间关系的新原则以及对付共同问题和威胁的新办法。

今天,在揭开铁幕和冷战结束后近十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听到对于二十世纪这一伟大的自由民主革命表示怀疑的态度。“到底有什么变化?”有些人这样问。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彻底评估已经发生的情况,并调查由于这一结构性变化而产生的无数新的机会,以及至今人们难得想到的各种远非简单的问题。

我的古老的国家格鲁吉亚是新独立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来观察正在这一新的两极化后的世界中进行的进程的各种优点和缺点。

尽管格鲁吉亚立国的历史可回溯到 3000 多年之前,但变化无常的历史使我们不得不在本世纪最后十年内再一次白手起家地开始建设我们的国家。开端是特别艰难的。共产党之后的完全无能 and 毫无经验的第一代领导层将格鲁吉亚投入冲突和内战之中。结果是经济的完全崩溃,并丧失了即使是我们从苏维埃制度继承下来的象征性的国家标志。格鲁吉亚实际上发现自己孤立于世界其余地区。所有这些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犯罪猖獗的现象,而根除这种现象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格鲁吉亚在 1992 年春季开始努力摆脱这种孤立状态,当时它成为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黑海经济合作的成员国,并开始积极与其邻国和较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正是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内,我们国家——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作出了它的选择。格鲁吉亚将走上通往以社会面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和民主社会的道路。尽管在道路上继续出现各种严重障碍,格鲁吉亚从未离开它为自己确定的道路。

建设我们民主国家的原则和实践并非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不再有两极对峙的情况下,各国际组织得到机会在整个地球采取行动,协助有需要的国家,并援助它们的发展。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联盟以及特别是美国、德国和荷兰以及其他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帮助。

1995 年的确是格鲁吉亚新纪元的转折点。随着这一年到来的是通过了新的民主宪法以及进行了第一次议会和总统选举。同一年,我们实现了财政稳定,并采用了新的国家货币。该年年终,在格鲁吉亚民主发展中,国内生产总值首次有了增长。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法律和秩序在我国占了上风,犯罪猖獗的情况最终得以制止。

但在同一年也就是 1995 年,震天响起了第一次爆炸声,这是针对格鲁吉亚国家元首的一起恐怖行动。这种野蛮行径向全世界发出了信号:并不是人人都感到喜欢格鲁吉亚朝民主的进展,特别是如果格鲁吉亚将会在它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获得成功的话。

最近几年表明,格鲁吉亚境内的积极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自 1996 年到 1997 年,经济年增长率约为 11%,汇率稳定,通货膨胀继续下降。

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我们在建设民主体制和建设并实施公民社会的法律框架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这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格鲁吉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我高兴地指出,随着格鲁吉亚继续改进民主机构和发展经济,我们将成为其他国家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国际援助的受援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果,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努力发挥新的作用。

几十年来,里海地区和中亚燃料丰富的国家被无法穿透的高墙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现在,它们已开始寻找各种出路,向世界市场运送其财富。高加索南部地区、特别是格鲁吉亚有出口通往黑海。这个地区四通八达,是东西南北之间货物运输的枢纽。今年 4 月以来,石油已经通过新铺设的巴库——苏帕萨输油管穿过格鲁吉亚领土,向西流去。在古代,格鲁吉亚曾经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条大道在古代曾经横跨两个大陆,在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桥梁,促进了文化融合和思想交流。目前这个职能再次恢复。我这里指的是大欧亚地区和相关的运输路线。

各国际组织和一些个别国家对恢复伟大的丝绸之路的想法表现出巨大的兴趣。欧洲联盟发起了 TRACECA 和 INOGATE 项目,这些项目为兴建运输基础结构筹资,并且正在研究多种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管道网络。美国参议院最近通过了由布朗贝克参议员提出的丝绸之路战略支助法案,该方案预计将向高加索南部地区和中亚各国提供援助,以加强独立和民主发展,并且建立运输基础结构,其中将包括多种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此外,日本政府还为新的丝绸之路制定了一项战略。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正在参加实施这个项目。高加索南部地区各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与欧洲联盟签署了伙伴和合作协定,这些协定已于今年 6 月生效。关于格鲁吉亚在建设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和尊重人权方面的进展,欧洲委员会已经承认格鲁吉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今年早些时候,格鲁吉亚已经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正如我前面所指出,我们在争取独立发展道路上取得的一些成就——即:我们参与全球性的项目以及我们与国际、区域和欧洲——大西洋机构接轨的愿望——已经使而且仍然使散布在前苏联整个境内的反动势力如坐针毡,这些反动势力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国家的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1995 年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此后还发生了其他挑衅行动和恐怖主义行动,其中包括又一次企图行刺总统。这些迫使格鲁吉亚偏离其已经选择的道路的企图是否会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变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的敌人将利用其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包括贿赂政客甚至贿选,使其喜欢的政权上台。

在目前全球化和日益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受经济危机波及。去年,在全球经济局势负面影响下,特别是当邻国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后,独立的格鲁吉亚亲身经受了这种消极全球经济局势的反响,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外贸活动中仍占重要地位。今天,我们可以比较有信心地指出,格鲁吉亚年轻的市场经济和银行系统成功地通过了这个考验,各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存能力。

未解决的各种冲突以及我国领土完整遭受侵犯,仍是格鲁吉亚最痛苦的问题——换言之,这些问题正是国际社会尚无法解决的一系列新威胁之一。由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在外部军事支持下进行了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运动,许多格鲁吉亚族和其他民族的公民被杀害,近三十万人流离失所。虽然我国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组织提供了援助,这些无辜受害者仍然生活在极端困苦条例下。这些受到严重创伤的人民受到非人道的残酷待遇,他们要求保护其最神圣的权利:在自己家里生活的权利。令人遗憾的是,与巴尔干的对峙不同的是,阿布哈兹冲突没有暴露在世界电视屏幕上,因此,国际社会很少注意到阿布哈兹冲突。我亲眼目睹了在那里所犯下的残酷罪行,我毫不怀疑,无论是在科索沃、卢旺达还是在阿布哈兹,被仇恨细菌感染的人都会失去人性,其行为都会同样的野蛮。

很难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在外国正规部队和雇佣兵的帮助下,原来仅占人口 17% 的阿布哈兹人将多数人驱逐出境,其原因仅仅是,这些人不是阿布哈兹人,而是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希腊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与此同时,出于种族原因,还进行了草率处决和大规模屠杀。

迄今为止,各国际实体——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俄罗斯联邦和秘书长之友小组——的介入迄今并未产生明显结果。我认为,所有这些企图之所以未能解决这场冲突,其原因之一是,阿布哈兹事态的真相尚未在最高一级的国际机构——《宪章》授予世界安全保障者职能的安全理事会——进行客观评估。如果不能正确地指出邪恶——也就是说不能对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的法律评估——就不可能与邪恶进行战斗,难道这一点还不明显吗?

虽然欧安组织布达佩斯和里斯本首脑会议最后文件都将阿布哈兹分离主义领导人的行动定位为种族清洗行动,但联合国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的 21 项决议并没有做出这么毫不含糊的评估。事实上,在外国反动势力怂恿下,分离主义领导阶层的唯一目标是改变这个自治共和国的人口结构。很难想象,通过请求和劝说,可以说服一个已经实现其目标的政权允许流离失所人士返回。

我不想被人误解。我们不想让我们的阿布哈兹兄弟流血,我们不想进行报复。不,我相信,假以时日,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将在自己的历史家园——格鲁吉亚——共同生存。但为了加速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解进程,必须公正地从法律上评估这场悲剧。

毫不奇怪,在自由概念获得如此广泛接受的这个世纪,人权得到特别重视。在格鲁吉亚被接纳进入欧洲委员会之前,各报告员认真审查了我国的人权状况,审查了媒体的自由程序、囚犯待遇——包括最严重罪犯的待遇,并且检查了人权的许多其它方面。我们感谢欧洲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生活这个关键方面的全力重视,以及它们不抱偏见的评价和建议。

尤其在对人权事务这样重视的背景下,我很难理解国际社会为什么漠视目前从阿布哈兹流离失所的三十万人民的命运,为什么漠视他们在自己家园生活的基本权利公然受到侵犯。问题不在于是否向这些人提供帮助。当然,如果联合国和各国不提供救援,他们将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但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对其处境唯一恰当的反应是帮助他们恢复其不可剥夺的权力,即允许他们重返家园,惩治侵犯其权利的肇事者,哪怕只是对种族清洗的罪魁祸首的行为作出适当评价。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

尽管在这个讲台上表达个人情感或许不很恰当,但谈到仅仅因为仇恨就动用武力将完全无辜的人民赶出家园,我就很难压抑自己的感情。我的心情很沉重。我

参与了结束冷战的复杂过程。我相信,与其他思想者一样,未来没有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允许非正义存在。在新的条件下,处于世界等级顶层的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将有可能防止个人侵犯文明的生存准则。

大会可以想象,当发生了对格鲁吉亚人口的清洗,而且至今在我的国家内仍未受到惩罚时我是何等的失望。我两次致函安全理事会,详细描述和说明了所发生的事情。但至今尚未看到任何实质性进展,即使在制订决议方面。经历了这次失望之后,我想我坚决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为结束种族清洗而在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我将这次行动看作是针对邪恶早已应当明确表达的坚定立场。但与此同时,任何人都不应把在科索沃的行动解释为对咄咄逼人的分离主义的坚决支持。事情决非如此。我始终相信,咄咄逼人的分离主义和运用武力操纵民主秩序的企图是当今世界最糟糕和最危险的弊病。

在冷战期间,核战争的威胁象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与此同时,局部冲突,无论其真实原因何在,不然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分析家一直在努力去确定导致今日侵略的病菌的性质,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根源。种种理论都很有趣,而关于它们与现实是否合拍的辩论无疑将持续多年。

另一方面,即使粗略观察以下今日的冲突,人们也很清楚,几乎所有冲突都涉及到种族少数错误解释自决原则,同时,强势民族及其中央机构错误理解与这一原则有关的少数种族权利。换句话说,这些冲突的背后,或是咄咄逼人的分离主义,或是同样咄咄逼人的对种族少数权利的践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这些冲突中,人口的某一部分遭到政治冒险家群体的厌恶。这一“异类”随之便因“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政策而面临灭顶之灾。今天,世界上有数百个地方,一些群体面对这种自决方式跃跃欲试,有可能推行这种令人遗憾的屡试不爽的方式,这种方式,我称之为人口工程。不难想象,如此以来,世界将陷入何等混乱的局面,而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只因为所谓的种族不恰当,将承受何等的苦难。

今天,殖民帝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自决要求制订新的、更清楚的公式,确保潜在冲突的各方充分意识到其要求的国际合法性的限度。在民主国家,政府平等地代表所有其公民的利益,自决必须被视为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表达自我的权利,但这

种表达不能超出国界,而国家则需尊重这些权利。不得以动用武力和侵犯领土完整的方式来鼓吹分离主义。

我还要补充的是,反对派为强制重新划定边界而提出的辩护理由始终围绕着所谓的必须恢复历史正义。而历史很难说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是按照当事方的利益来加以解释的。我认为,新思维也应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在国际关系中,或许,人们不可以过分强调、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加节制地鼓吹历史前例的作用。这正是《赫尔辛基协议》关于现行边界不可侵犯性准则的意图所在。

与此同时,在确立民族意识上,公民对其自身历史的知识要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在当前这个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时代,这一点更有其特殊意义。单个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努力不足以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国家无论大小,其对世界文明和文化发展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我们这个小国也是如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显然经济、环境、消除贫穷、人口进程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主要挑战,但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着手来保护和维护民族文化遗产,它是丰富和陶冶人类精神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格鲁吉亚人说:“让我们拯救文化,文化将拯救我们。”世界性的单一化将威胁到小国的特征,应当列为当代祸患之一。我建议我们建立一种集体的机制,以保护文化。

近年来的事态清楚表明,现有的全球安全集体责任制远远不够完善。当然,自从消除两极化以来,我们大大改善了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成功开展活动的前景,而过去,由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对抗,这些组织的决定往往无法执行。但现在,它们仍然时常无法有效处理新的威胁。除非实施消极制裁,否则就无法确保秩序,而这正是联合国要想设法避免的。虽然《联合国宪章》确实规定了强有力的机制来确保安全,但第七章的强硬言辞连同军事参谋委员会往往不过是纸上谈兵。当然,联合国的创始人应当以其智慧和眼光而受到赞赏,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就我们对世界命运的集体责任而制订的机制是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构思的。

必须承认,尽管人们为建立世界秩序作出了努力,但地球仍然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种更为明确和更为公正的秩序。今天人类面临的大多数威胁都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能力范

围。它们是全球性的。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单独应付它们。正如每个国家内部的情况一样,国际社会特别需要在就一系列基本原则作出承诺方面达成一致。许多章程和公约似乎都表明了这一点。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人们在公开声明中谴责恐怖主义,但似乎许多人仍然将之视为实现政治和其他目的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手段。否则,如何来解释恐怖主义分子尽管身份暴露,却并没有躲在丛林里,而是在不同国家招摇过市呢?

当然,世界确实在威胁发生时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反应。各国和国家联盟的确作出打击全球痼疾的严肃努力。有时正如科索沃不久前发生的,它们在完成这种任务时强制实现和平。我的立场是,没有人有道德权利谴责北约进行这次行动,尤其是通过其不采取行动而正中干扰和平者下怀的人。

但这并非所谓集体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几个民主和发达——因此强大——国家领导世界其它国家。当然,我们只能为此感谢它们。但如果对世界命运承担责任的人在国际组织确立的机制框架内完成其任务,会对所有人更有利。我们已经提议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并处理否决权问题,以使安理会适应目前需要。事实上,在两极世界中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消进行强制执行和平行动的可能性,因为那些年代里在某种程度上任何部队仅代表一极。

随着冷战结束,用集体决定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重新出现。制止侵略科威特的决定使许多人希望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将受共同原则的约束,道德办法将普遍存在。还有其它令人鼓舞的事件。但在科索沃,一股新的冷风似乎开始从安全理事会刮起。尽管有人道动机,北约所进行的行动——同今天任何道德行动一样——也包含务实内容。如果北约不干预科索沃,难民流入必然会破坏欧洲这一十分重要地区的脆弱平衡。也许一些国家会卷入该冲突。我们甚至可能目睹一场巴尔干大战。

在今天的世界上,国际政治的道德办法从务实的角度看也有其道理。如果我们想为人类谋利益,我们应从道德立场采取行动。这应是 21 世纪新思想的支柱。

秘书长的话使我们受到鼓舞,即不久将采取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措施,改革将使我们能够在处理今后区域冲突时根据国际法准则采取行动。

尽管今天存在严重威胁,可以不过份地说,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从未有更独特的机会来创造公正的世界秩序和更和谐的国际家庭。的确,有时仍可听到对抗言词,我深信今天东西方之间的争议是过去的影子,被人为移植到现在。这些争议过时了。人们可以说这样做主要为了掩盖个别国家的严重内部问题。不流血地结束了冷战这一人类历史最危险的冲突的一代人可在各大陆、各国和个人之间找到共同语言,并通过文明对话缩短导致解决今天和未来全球问题的道路。

现在我们克服了意识形态对抗的分界线,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消除将世界各国人民分为富人和穷人、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的其它界线。也是在这个进程中,新的对策和新的思想至关重要。我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提到,全球化的意思应不仅是进入市场的机会、跨边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通和财政相互依存。与这一切平行的应是对地球命运负责任的全球化和对今天世界太小,富裕和贫穷不能无痛苦共存的认识。我们必须找到减轻最穷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方式。否则,缺乏财政资源的永久压力将使它们不能摆脱贫困,当然无法建设自由的社会。

帮助这些国家建设自由社会是务实的目标,不仅是道德事业。在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一些国家贫穷将在另一些国家产生恐怖主义、毒品和犯罪的反响。为了得到安全,未来世界应由至少中等富裕、自由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将推行透明和可预见的国内和外交政策。我回顾在不同国际论坛上许多发达国家领导人发出的呼吁,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上令人鼓舞的发言,他在那里强调减免穷国债务负担的至关重要性。

还有人呼吁,我们应在发展中和经济薄弱国家没有沉重债务负担情况下进入 21 世纪。事实上我们可考虑旨在 21 世纪开始时便解决债务问题的十年方案。这将是十分公平的决定,这种决定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开始时将成为指导许多国家迈向更光明未来的灯塔。

我曾多次说过,我一般地说对人类未来是乐观的。这种乐观基于一种信念,即我们慢慢地获得经验;我们可

以学习并可以发生变化。战胜敌对魔鬼并指出一体化新方式的《马歇尔计划》和战后欧洲是这方面的良好例子。

1986 年,当许多人在这个讲台上谈到“星球战争”和人类结束时,我宣布新的思想为世界提供“星球和平”,而非“星球战争”。我感谢上帝这一宣言不只是一种梦想,人类既在地面,又在天空逐渐摆脱核战争恶梦。这使我有理由希望,具有不断进行理性振兴能力的人类将在下个世纪一心一意地使之成为和平与自由、公正与普遍和谐的时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格鲁吉亚总统刚才所发言的讲话。

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续)

一般性辩论

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讲话。

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先生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若斯潘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当选大会第 54 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说明国际社会对你和你的国家的敬重。我这里还要对秘书长表示赞赏,他肩负着促进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加强联合国行动有效性的重大责任。最后,我要祝贺联合国最新的三个会员国。联合国所代表的伟大和崇高理想,在今天依然富有生机,对此我深信不疑。

联合国存正在从事一次巨大的文明化努力,尽管这一任务不断受到挑战,但却永远是必要的。联合各国人民一道为和平与发展工作,确定一种法治体制规范国家间关系和实现共同的标准:这些就是联合国的目标——一种文明化目标。

首先是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实现这一目标。安全理事会在这一使命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

这种突出的作用来自《宪章》的规定。法国将常常在必要时让人们记得这一根本原则。毫无疑问,有时出现紧急的人道主义局势决定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但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例外。正如科索沃的情况那样,我们必须注意将这一行动重新纳入《宪章》的范围。我们根本的原则是,应该由安全理事会解决危机局势。为此原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新战略再次提到《华盛顿条约》承认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方面具有主要的作用。

事实上,联合国的普遍性是无形的,联合国必须努力对危机作出反应,不论危机发生在何处。我们近年来在几个大洲毫不犹豫地正是这样做,而我要表遗憾的却是在涉及到非洲时联合国所表现的相对胆怯。非洲大陆的悲剧极为严重,要求我们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普遍性同行动的互补性是一致的。为有助于效益,联合国必须在世界各地鼓励有能力在一开始就处理危机的国家之间作出区域安排。这正是《宪章》第八章的精神。区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在不影响后者权威的情况下现实地分摊任务。例如,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加强非洲维持和平能力方案,加强非洲的维和能力,办法是与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在联合国主持下提供援助。

国际安全还要求通过多边和可核查的协定继续进行裁军。这是法国一项不间断的目标。法国希望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审查会议召开前几个月重新启动裁军大会的工作。法国希望《全面禁止试验条约》迟早生效、开始关于禁止生产核武器用途裂变物质的谈判和缔结《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我们不会支持任何可能使《反弹道导弹条约》产生疑问和破坏战略平衡的发展。

联合国的使命不仅限于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由于人类对更大自由和责任的期望不断增长,这一使命延伸到在国家内部捍卫人类尊严,并在必要时如《宪章》允许的捍卫人类尊严不受国家的伤害。国家煽动的暴力过去几年造成了重大人道主义危机。平民成为目标,整个人口被强迫流离失所,难民营已不再安全可靠。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因此,我们必须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国际干预以帮助受害者的原则。

每一危机都提醒人们追求和平和尊重法律和个人的创始原则的必要性。一个实例就是科索沃的冲突。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说明了这些原则和这种决心。该决议规定了解决的基础。

我们为自己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保证所有人的安全,组织重建,确保社区间的共处,将权力转向地方领导人,促进民主和多元化。秘书长特别代表和驻科部队指挥官作了非常好的工作。但是,还需作更多努力。必须制止暴力,在冬天到来前停止人口外流和建造住房。在政治方面,必须为将来作准备,这就要求建立社区之间的对话。我希望 2000 年举行选举。法国同欧洲联盟的伙伴一道在这方面作了坚决的努力。欧洲联盟提供了科索沃捐赠国会议确定的国际筹资的一半。

在东帝汶,又有一个民族要求其权利得到承认。他们的大多数通过全民公决选择了独立。有些人企图以暴力反对这一选择。因此,我欢迎 9 月 15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264(1999)号决议。该决议为恢复和平铺平了道路,应该能够确保圆满实现民主进程。法国参加了根据安全理事会决定建立的国际部队。

因而,联合国依然忠于我们去年联合国 50 周年时所纪念的那些价值观。但是要使这些价值观在所有地方都得到尊重,还需作出更大努力。为实现这一点,必须加强国际刑法。法国积极支持海牙和阿鲁沙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将是法律工作的新的、决定性一步。法国希望尽快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为此目的,法国已经修订了法国宪法。

为完成使命,联合国需要可靠的手段。为应付财政困难和防止这些困难成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法国是彻底和无保留地这样做的。缴纳会费的国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将推动联合国的必要改革、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我向大会表明并希望大会赞同我的另一个坚定信念,即:联合国非常适合对付我们新世界的挑战。事实上,联合国的使命因全球化而得到加强。

最初,在世界一级组织各国间关系的想法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乌托邦。但它仅仅具有超前性质。出于以下原因,我确实认为联合国非常现代。我们这一不稳定的世界需要组织,而联合国的目标一直是寻求对世界进行更好的组织。联合国与一个网络的世界是相符合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网络,一整套由专门但独立和协调的机构组成的丰富和独特的网络。在半个世纪中,联合国制造了可适应我们世界的行动工具。联合国并没有衰老,而是与世界一同成长。它必须使我们能够面对当今世界出现的新的挑战。

矛盾的事态取代了十年前两个集团对峙结束后人们兴高采烈的幻想。全球化产生的并不只是一种结果。在产生统一的同时,它也产生分裂。在产生明显进步的同时,它也导致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在使社会相互开放的同时,它也具有产生相同性的威胁。在释放能量的同时,它也释放必须受到控制的消极力量。因此,在人口迁移和文化冲突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失去特性的日益恐惧、宗教不宽容和仇外心理。在五大洲均有存在并本身就是移民国家的法国,在历史上已经历了这种对峙。法国了解它们带来的风险和它们带来的财富。我们将全力支持将于2001年举行的种族主义问题世界会议。防止出现往往引起致命后果的偏见将为子孙后代的和平奠定基础。

全球化的成果并未得到平等的分享。经济开放、贸易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加速都会促进增长。但是国家之间和经济内部的不平等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之中。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坐视不管。通信网络的迅速扩展并没有使人人受益。但信息来源的扩大、思想的日益流通和大量新发明都使人充满了希望。由于通讯费用降低,因特网可成为南方国家企业界的财富。但教育方面的不平等阻碍了获得这些技术。这些增长知识的强大工具可成为不平等中难以克服的因素。通讯也是一种权利。必须打破信息来源和生产及分配手段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对这一权利造成的威胁。法国坚决捍卫文化多样性。全球化必须鼓励我们所有人考虑到我们这一世界的脆弱性——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共同福利。我们的环境不是一种产品,不是我们可以提取使用而不顾子孙后代需要的原料。真正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自1992年里约首脑会议以来,由于有了这一认识,已通过了一些与气候、生物多样化和荒漠化有关的主要承诺。关于气候变化的《东京议定书》和最近关于一项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证明了这些成就的重要性。但是未来气候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敦促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努力。

地球是脆弱的,但是人类也是脆弱的。新传染病的传播危及整个人类的健康。发展中的不平等加重了这些灾难。如今已有4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疾病在非洲的传播是我们

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后面将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全球化正在改变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在这个领域情况急剧恶化。由于流动性剧增,犯罪网络能够利用各国间法律的差异以及有些国家法律的弱点,逃避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国准备全力以赴与这一祸害作斗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在去年大会特别会议上表明将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打击国际贩毒,它积累了专门知识,成立了专门机构并起草了一套理论和法律框架。必须加强这些努力,但是,各国尤其必须更加致力于采取行动。1月已开始在维也纳就制订一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公约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在2000年取得圆满结果。

面对全球化,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可以继续实施所谓的普遍经济法则,因此放弃我们的政治责任,或者我们可以寻求为全球化建立一种秩序,从而控制我们集体的前途。就我而言,我认为,全球问题需要全球作出反应,而且对一个不稳定的世界需要加以管制,这需要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可能称之为的“规章”。这个世界需要规则。它需要联合国。

这一选择也是一个主权问题。正如秘书长去年12月8日在巴黎指出的那样,我们宪章的第一句话“我联合国人民”,表明了普遍的主权。但是为了各国人民的主权得到确定,他们必须找到获得机制的手段,控制手段和全球化好处。这是我的第三个信念。世界变得越全球化,面对采取单方面政策的诱惑,就比以往更需要使我们的行动基础建立在大家都尊重的多边规则上。首先这些规则涉及到经济。我们必须制订游戏规则,以便大家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我们必须制订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以及大经济行动者、中小企业和我们国家中工作和进行生产的公民之间的游戏规则。

在财政领域中,我们必须加强货币和金融制度的稳定性,其办法是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合法性,使发展中国家更密切地参与通过共同规则并且使私人金融操作者作为危机中国家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任。自1997年和1998年危机以来取得了真正进展。法国以其建议对此作出了贡献,尤其在避险基

金和财政安全方面。法国将继续为此目的工作,因为仍需做许多工作。

这种游戏规则应基于国际机构之间更好的协调。自 1945 年以来,国际合作尊重机构专业化的原则。今后任务是使其更为互补。经济和贸易规则不应无视最基本的社会和环境准则。因此,法国支持一年前国际劳工会议通过一项有关劳工领域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伙伴进行对话和制订基本标准的不可替代的论坛。劳工组织应与其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密切关系。

为了使这些游戏规则得到更好的尊重,必须与最穷的国家建立适当合作。其债务负担继续是发展的主要障碍。七国集团国家在其科隆会议上保证进一步给予债务减免。法国促进了这一做法。将适用三项原则:团结,这要求我们给予最穷国家最优惠债务待遇;公平、这要求富国平衡分担财政努力;责任,受益于这种援助的国家有责任采取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官方发展援助仍是不可缺少的。法国将继续提倡最富国家作出更大努力。

确认共同价值观和规则应日趋激励我们的行动。人权是这种对策的核心。我特别提及最弱者——儿童。宣布最恶劣形式童工为非法的劳工组织公约是一个新的例子。《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必须尽快得到目前正在谈判的两项议定书的补充,一项议定书反对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另一项议定书反对贩卖儿童及儿童卖淫和色情活动。

确认妇女权利是承认其在教育、创造财富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也是为了制止她们遭受的歧视和暴力。法国已经使男女平等成为振兴其公共生活的基石之一。已提交大会核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附加议定书为妇女提供以个人身份坚持其权利的可能性。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大会 2000 年 6 月的特别会议将强调自 1995 年北京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

重申人人健康的权利意味着在各地制止大流行病。1997 年 12 月在阿比让,法国提议设立一个“治疗声援基金”,以动员国际社会照顾并治疗艾滋病患者。参与抵制艾滋病的南方国家和协会热烈欢迎了这项建

议。但艾滋病对发展的影响仍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来减少这种瘟疫。只有联合国可以使这种努力具有必要的广度。

预防原则应是我们环境和健康安全方面行动的基础。基于北方和南方有区别承诺原则的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构思得很好的国际行动的例子。必须继续这种努力。我们将这样做,其办法是同我们的欧洲联盟伙伴一起倡导一项森林问题世界公约,并且加紧努力以减少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排放。预防还必须是监测食品安全的指导原则。可持续农业、产口质量和保持各国粮食传统的综合关切说明最近的强烈反应。因此法国打算看到即将进行的世贸组织谈判考虑到这些要求。

为了处理和克服世界问题,从全球化中得到最大好处,我们需要各国认识到其责任,而且我们需要联合国做“更多的”工作。通过一个由振兴的使命感所加强、主权国家和区域组织所支持的联合国,我们将能够进一步尊重人权,促进民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并帮助所有人实现其潜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法国总理刚才所作的发言。

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哈提卜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第五十四届主席的职务。我深信,你的经验和技巧将使本届会议工作获得圆满成功。也请允许我深切赞赏和感谢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他的伟大和杰出领导使上届会议获得成功。

我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为实现和强调联合国各项目标和原则进行了英明领导和出色工作,并感谢他为实现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第二个千年最后几个月,当我们向其告别并等待第三个千年降临时,大会本届会议在重要的历史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充满复杂感情的时刻召开。

我们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尽管 20 世纪发生了严重的苦难和伤痛,但人类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

满怀希望地憧憬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将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能够以对地球的归属感和以更加公正与和睦的方式,真正科索沃在伙伴关系中。我们应该能够有进一步的能力来集体对付我们面前的主要挑战,并对需要有长期全球性远见的变化作出反应。这将会增加对我们所面临的难题与事务作出回应与解决办法的能力。

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于几个月前陷入悲痛之中的约旦的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那时我国失去了伟大领袖,即已故国王哈桑·本·塔拉勒—愿上帝祝福他的灵魂。他成功地将约旦从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转变成在充满动乱与战争地区内的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绿洲。我国刚刚开始一个在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领导下的新时代。在我们满怀希望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国王陛下大力承担了继续领导约旦走向进步与繁荣的责任。他还坚定地承担责任,使约旦继续对中东建立和平作出极重要与关键性的贡献,并继续在国际上作出慷慨作出贡献。他与约旦历届领导人一样坚信,我们的国家属于这一国际大家庭。约旦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我国已故的领导人是一位独特的国际领导人,他坚定不移地深信联合国的作用,并深信和平解决冲突。他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为在中东实现公正、全面与持久和平而奋斗终身,以此表达了他的对这些原则的信念。他的这些工作是出于他坚决相信人的尊严,人在不受任何形式的不公正与专制主义情况下自由生活的权利,也是由于认识到人的生命太宝贵,不应当浪费在对抗与战争中。人有权利过自由与尊严的生活,将其所有资源与精力用于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参加为子孙后代建设繁荣与安全的未来。

我们不幸已经作出的伟大领袖人的一生的就是建设现代约旦的写照,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卓越贡献也是一位相信崇高的道德原则与最高尚美德的历史性领导人所能取得成就的罕见的实例。当约旦人民看到全世界—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与他们肩并肩的走在一起,和他们一样为失去他们新生活与现代国家的缔造者而感到悲伤时,他们深为自豪与赞赏。对约旦已故国家领导人所建立的宪法及体制结构的力量与持久性,约旦人民也深感信任并有充分的信心,这种结构保证了国王

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时代有一个稳定与成功的开端,而其过渡的方式赢得了全世界的赏识与尊重。

今天,约旦人民齐心支持国王,并跟随他走在实现其愿望与理想的道路上。在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的领导下,约旦正以坚定的信念进入新的时期,继续走过去与将来都使是约旦的国内外政策与众不同的同一条道路上。

在过去几个月里,约旦继续努力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在过去3年里这一进程由于拖拉导致实际上的僵局,所有这些都严重地考验该地区各国人民对整个和平进程的信念。今年5月以色列议会选举结果使人对恢复这一进程,使其再次走上轨道产生了新的期望。过去几个星期的积极事态发展表明本地区现在正面临在所有领域实行全面和平的第二次历史性机会。我们真诚希望本地区各国领导人能抓住这一机会不辜负各国人民的希望与理想,毫不迟疑的作出必要的果断决定,使谈判取得成果。

巴勒斯坦问题曾经是,并且仍将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及中东危机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这地区建立和平首先需要公正解决这一问题而其解决方式和使本地区各国人民满意,并且如有必要将予以捍卫的解决方式。过去整整一年里,约旦呼吁执行《怀伊河备忘录》该项备忘录是在已故的侯赛因国王空前的参与帮助下缔结的。我们一贯认识到实施这项《备忘录》对在所有方面恢复和平进程将产生的影响,对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建立信任与伙伴精神的影响,以及对在该地区重新建立对和平进程的信念的影响。《沙姆沙伊赫备忘录》的签署使《怀伊河备忘录》的实施方式更有可能如同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关于最后地位问题的谈判,从而达成的解决办法的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实行其自决权利,其中包括在其民族土地上,以圣城—神圣的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独立的国家。

正如阿卜杜拉国王二世所强调,约旦将继续为谈判提供支助。我们对其成功有直接的兴趣,因为议程上的问题涉及我们国家利益,特别是难民问题、边界问题及耶路撒冷问题。在过去50年里,约旦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承担了难民问题的负担。这对于约旦的资源与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因为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近东难民救济工程处)每一次减少服务都加重了约旦的负担。约旦政府 1998 年为难民提供服务的直接开支达到了近东工程处同类服务开支的 4.75 倍。约旦政府承担的全部开支等同于近东救济工程处在整个中东所有活动的全部预算。在难民问题未根据国际合法性得到解决--从而永远地全部结束这一历史篇章之前,约旦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允许近东难民工程处的作用及其各项目有任何削减。约旦并且呼吁捐助国继续支持近东难民工程处,使其能继续履行各项责任。

关于其他轨道的和平进程,约旦认为,全面解决是在这一地区建立和平的先决条件。如没有这样的解决,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保证持续性。因此,约旦坚决支持恢复叙利亚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努力,并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即谈判应当从原来中止的地方恢复。约旦领导人将不遗余力地使两项谈判都取得突破。

过去几个星期里人们对实现这一点产生了希望,这特别是由于叙利亚重申,为建立和平而努力,以及关注和和平进程,使其走向理想的目标,即实现公正持久与全面的解决方式。叙利亚政府方面还有一些积极的表示,同时以色列政府也表示深信与叙利亚达成和平协议具有关键重要意义。地区各国人民满怀希望地期待这些积极事态发展,同时真诚希望不错过这一历史性机会产生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导致一项解决办法,从而通过以色列实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及 425(1978)号决议,撤出叙利亚阿拉伯戈兰高地以及黎巴嫩南部,恢复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合法权利。

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由于无法实现全面、公正与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遭受了空前的艰难困苦。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法为任何一方提供安全的无谓的军备竞赛之上。今天,本地区各国人民期待着和平进程的真正进展—即能为结束军备竞赛、使各方相信和平是能为所有各方带来安全的唯一选择而创造有利环境的那种进展。这还将使它们确信需要使中东成为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这需要各方面承诺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难民、经济上的差距和水,以及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问题需要有效的区域合作和具体的国际支持。不解决冲突的根本性政治方面,该区域将继续承受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缺乏合作的后果。除非这些问题得到

解决,否则它们本身将会恶化,造成该区域冲突的新温床。

在我们区域的东侧,伊拉克人民继续遭受持续实行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空前困难。伊拉克人民在他们的健康、营养、教育和发展前景方面为这些制裁付出代价。这对整个区域构成严重的潜在危险。

因此,约旦呼吁通过解除制裁结束这些苦难。约旦还呼吁实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那些关于科威特战俘和失踪者的决议。它同时又呼吁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审查,以导致伊拉克从这种局势中解脱出来,并确认它维护作为区域安全的主要支柱之一的伊拉克领土完整的立场。

约旦地处两个极其复杂的局势之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这两个局势是由于中东危机的后果,更具体的是由于在过去三年在和平进程中缺乏进展,以及由于继续对伊拉克实行已经历时九年的经济制裁造成的。面临这种局势,即便是比约旦有更大能力和资源的国家都会有困难。虽然约旦致力于实施一项一体化的改革方案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并采取困难和痛苦的经济措施,但这两个局势的影响使约旦几乎无法实现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它还继续承担着巨额外债。

看待约旦的实际经济局势和它面临的挑战,而不将其与对它有影响的区域环境联系起来,就不能真实地了解它的经济局势。虽然约旦感谢和赞赏国际社会支持约旦努力应付其巨大的挑战并协助约旦在维护该区域的稳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约旦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了解它的经济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特别赞赏今年 6 月在科隆举行的工业化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最后公报。公报体现了帮助约旦的政治意愿,并呼吁考虑减轻约旦的外债负担。我们希望友好的债权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把这种政治意愿化为行动,使约旦能够减少约旦外债,其减少程度应能使约旦经济获得恢复,并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科索沃人民被迫经历的悲惨局势是对国际社会的严峻考验,考验它在本世纪末是否有能力防止种族清洗罪行和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以最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的形式发生。这个事件提出了极其严重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联合国的作用和各国在不针对无自卫能力的非武装平民犯下大规模罪行的情况下有权宣称其主权的限度。

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制止犯罪行为的能力向所有那些企图违反国际法和犯下类似罪行的人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应自以为他们的国内军事力量可以确保绝对的统治,包括侵犯人权。对主权原则的维护不应推翻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务。

另一方面,作为本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必须寻求适应的机制,以确保加强联合国及其作为表达国际社会防止这种犯罪的决心的基础的能力,以及作为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协调和组织国际集体行动的总机构的能力。

这种局势表明,需要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以使各国人民享受对他们的多样化的尊重并参与形成一种确保他们彼此共处的世界良知。各国人民在接受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方面继续取得的进展使我们迫切需要在国际制度的范围内加强民主。既然联合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支柱,它的发展必须反映国际上的新现实。

我们国际社会紧急需要对国际局势进行以下所有方面的真正审查: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人权。我们希望,将于明年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将为这样一次审查提供机会。

虽然我们看到,联合国所审议的很多问题和危机仍然有待解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联合国的失败,它更多地是表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的重要性。

此外,全球化的挑战构成新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对发达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环境污染,以及对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例如债务、失业和经济衰退有全球性的协调解决办法。这种办法还必须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使其能够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会,并避免它的消极影响,以防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继续扩大。这些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存在将会使发展中国家继续处在全球化的边缘。

尽管在我们开始本世纪大会的最后一届会议时我们继续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我们不应忽视最近所采取的很多积极措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是为对付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犯罪者并防止他们逃脱惩罚而采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我也必须提到《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缔约国第一次会议的成功结束。

这些成就有助于加强人的安全和对人权的承诺。它们还提供了例子,表明存在着在很多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在促进对谴责和禁止恐怖主义的国际承诺方面。

在一个不同的方面,约旦欢迎利比亚和联合国就洛克比问题达成的协议。它还赞扬联合国秘书长作出的艰苦努力,这种努力促进了达成一项协议。它呼吁在消除了这些制裁的原因,引渡两名嫌疑犯以便受审之后完全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

关于区域危机问题,我们呼吁我们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朋友利用和平手段解决他们的冲突,并避免将会严重危及印度次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和平的任何升级。

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争端,约旦象它一贯所做的那样,呼吁通过以尊重为基础的对话解决这个争端。它还希望,伊朗将响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依照具体的时间表和议程开始进行对话的要求,以便达成符合国际法的解决办法。国际法不接受以武力占领领土。

约旦特别重视在各宗教和文明之间保持对话,以使各种信仰、宗教和文明的想法更加接近。这还将为发展人道主义思想创造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思想呼吁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对抗。这些努力已导致国内和国际上更多地了解这种对话的目标。我们希望,联合国将通过其专门机构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对话方案。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利用对话克服我们今天看到的危险的歧视性做法,例如恐伊斯兰症。伊斯兰正在受到严厉的和没有道理的攻击,这种攻击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把伊斯兰与那些把宗教作为工具伤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对各国穆斯林人口的歧视和任意行动,只是极端主义思维的结果,完全背离文明行为和人性原则。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如何对付这种伊斯兰恐怖现象,以防止其蔓延。

很多国家最近遭受的自然灾害,使我们想起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都面临着在我们中间不以种族、宗教、财富和地理地位而加以歧视的现象和挑战。我们对最近遭受地震袭击的土耳其和希腊的朋友表示同情,并对它们相互表示的对其痛苦的积极的情感表示钦佩,我们意识到应付自然危险和灾害同应付其他挑战一样,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真诚政治意愿,以保护我们都平等所属的地球。

议程项目 8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会议委员会主席的信(A/54/313/Add.1 和 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文件 A/54/313/Add.1 和 2 所载 1999 年 9 月 15 日会议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两封信。各位成员都意识到,大会在第 40/243 号决议第 7 段中决定:大会的任何附属机构都不应获许在大会常会期间于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除非有大会明确授权。

正如文件 A/54/313/Add.1 所表明的那样,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授权大会关于执行社会发展和未来倡议的世界首脑会议的结局的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在纽约举行会议。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采纳会议委员会的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正如文件 A/54/313/Add.2 所表明的那样,会议委员会建议大会授权新闻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要会期期间于纽约举行会议。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采纳会议委员会的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通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可以看到,本次会议为了照顾今天上午名单上的所有发言者,而一直开到远超过下午一时。在这一点上,我谨再次提醒各位成员注意:大会在第 51/241 号决议附件第 21 段中,指出了一般性辩论中每次发言最长到 20 分钟的自愿准则。

我呼吁今后会议中的发言者尽量在一般性辩论中遵守这一 20 分钟的自愿准则。

下午 2 时 5 分散会